案语：为了及时地把握文化自信理论与莫言文学道路及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关系，我们组织了这一组“文化自信与莫言研究新视野”的笔谈。本笔谈以文化自信理论为指导，对莫言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要点和难点，进行了研讨。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拓展研究界面，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文化自信与莫言研究新视野（笔谈）

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历程，可以说就是倾其全力寻找中国文化自信的艰辛而丰硕的文化长旅。新时期伊始，新鲜而繁杂的世界文化艺术波涛汹涌地涌入了中国，让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震惊，纷纷开始了摹仿与追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更深刻的思考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之间，开始了融裁经典、自铸伟辞的新阶段。并且在世纪之交，臻于一代作家的全盛时代，向世界展现了百年中国由衰败沉沦、亡国灭种危机中起死回生，壮士断腕，凤凰涅槃，重新走上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伟大历程，彰显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彰显宏大历史时空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气象，同时，也对巨变、转型中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生动而丰饶的文学显现。这才是中国当下文学的主脉吧。莫言的文学创作正体现了中国当下文学的主脉。

关键词：莫言；文化自信；中国经验；中国气象；文学主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1-0001-21

莫言·中国名片·文化自信

张志忠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中国文学正在成为一张靓丽的中国名片，向世界彰显文化自信。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四国，其中有一项活动，是率团出席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随同他出席这一研讨会的，还有铁凝、莫言、麦家三位知名作家；同年同月，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彭丽媛邀请比利时王后玛蒂尔德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参观。文学系毕业学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向玛蒂尔德王后赠送了自己的作品集。在许多重要场合，莫言和当代作家正在成为一张光彩熠熠的中国名片，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情怀和强劲脉动。

在更为广大的意义上，莫言和当代作家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就以我们“山东作家为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穿越‘文革’灾难和战争硝烟，凸显了沂蒙儿女‘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意识，张炜的《你在高原》气势磅礴，在时代转型中探寻着民族的精神高原，莫言的《红高粱》所写余占鳌带领众乡亲与入侵的日军血战到底抵死相拼的墨水河大桥伏击战，是中国农民伟大抗战的英雄赞歌，《檀香刑》歌颂20世纪初的抗德英雄孙丙，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豪迈表现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张志忠（1953-），男，山西文水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样的顽强抗争、不懈追求，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列强鲸吞、内乱频仍的危局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浴火重生，再度崛起。”[1]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联、作协双代会上强调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2]

从这样的理论高度，观照和总结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内在肌理，是我们这些老中青三代学人的重要任务。

莫言自从以《红高粱》蜚声中外文坛，就一直伴随着来自海内外的各种争议和批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就对莫言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比如说，莫言小说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小说“太落后”，欧洲作家都在写心理写静物，一个苹果可以写20页云云。而且，顾彬不仅是剑指莫言，他对莫言的批评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严厉批评的一部分。虽然说，他的“垃圾论”不无以讹传讹的成分，但他的“五粮液”与“二锅头”之差异说，却是言之凿凿的。莫言在诺奖获奖演说中，特意用《讲故事的人》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定位，当然不会是专门针对顾彬进行回应，而是彰显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彰显莫言如何在福克纳、马尔克斯和川端康成所代表的世界文学，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蒲松龄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以及齐鲁大地乡土文学尤其是口传文学传统的融汇中，在以手中之笔描绘20世纪以来风云变化诡谲多变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登上文学创作的高地。

顾彬的严厉批评，代表了来自海外的一种不同的声音。即便是那些对莫言褒扬有加的声音，一方面是对莫言的海外传播与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往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命题。比起顾彬的批评，海外学界对莫言的称赞和褒奖，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而且，早在莫言荣获诺奖之前，他就是海外各种翻译版本最多、荣获东西方各种文学奖项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但是，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我们却很少会关注到这种现象，很少愿意在平等对话中对海外莫言研究的一些现象做出积极的商榷和纠偏。比如说，莫言荣获诺奖的颁奖词，在我看来，就是不无值得推敲之处的。诺奖颁奖词陈述的颁奖理由，从六个角度称赞莫言的文学成就，而且在用语上常常使用最顶级的赞美词，有一些部分，和我们的基本判断有相似之处，如莫言作品中人与动物植物和乡土大地的浑融描写，莫言的狂放不羁的神奇想象力，莫言表现乡村生活的沉重苦难，也歌颂伟大的乡村母亲和乱世英雄，等等。尤为值得提及的是颁奖词中“莫言是个诗人”的论断，以及两次讲到莫言的讽刺艺术，都是值得我们予以高度关注的。但是，诺奖颁奖词也有非常明显的破绽，有对莫言的误读。对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获奖不是一切，如何在对莫言进行阐释中，争夺话语权，发出我们的声音，彰显莫言创作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参考文献：

[1] 张志忠.文化自信·中国故事·全球化[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906/c404034-29518810.htm

[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

文化自信与母语艺术语用的高度自觉

季 红 真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4）

文化自信来自对于母语领悟的高度自觉。

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而文学的文化自信尤其依赖对于母语艺术语用的高度自觉。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语言的文化象征功能，也就是语言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独特魅力。人类的两大信息传递系统中，生物工程的长足发展由于染色体螺旋型结构的发现而解决了生物遗传系统的奥秘，但由左脑控制的语言信息传递的系统至今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们搞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这也关联着一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从语言起源发展的历时性与作为符号系统的共时性，到语用学等分支的兴起，带来对语言无意识结构的重视，都要依赖对于母语的领悟。只要是用母语写作，就不可不重视对于母语艺术语用的高度自觉。否则，文化的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由此出发，一系列纠结的问题都需要理清基本的学理才能讨论。比如翻译文学，并不是原生的外国文学。语言有不可译的部分，而且翻译过程中有变异。首先是选择，其中有基于鉴赏的认同，也有经验世界交集的体验共鸣。其次，有错误，影响到阅读群体的是错误的翻译；其三则是二度创作，译者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发挥。特别是汉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其它系统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文化壕堑，拉美作家频频获诺奖原因之一是他们都是以西班牙语写作，西班牙语与英语有亲属关系，转换过程相对容易。汉语的传播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要繁难得多，依赖翻译者的双语水平。莫言能够获奖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大有关系，图像的兴起是他被其它语系读者关注的前提。而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也是依赖汉译，研究域外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首先应该关注他接受的方式，以及认同的角度。而且，还应该考察传播的历史与方式，这是必须做的发生学功课。

语言是历史的存在，现代汉语的历史不到百年，是在外来语言文化冲击下形成的新兴语言。我们遭遇的最大文化史事件就是汉语的规范化运动，从小学语文到大学的现代汉语教学，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推动这个规范化的运动，所以语文教师要不断通过普通话的考核。但文学要植根民族的历史生活，首先面对的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裂隙，体现着从宇宙观到人生观的价值冲突，还有思维方式的本质性差异。方言是古汉语，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种种信息，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对作家的影响首先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借助口语的形式，一开始就是现代白话文的重要来源，也是现代汉语的重要资源，是口语与书面语的裂隙可能在创作中弥合的文化基因。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研究莫言的作品，就是发现这种文化基因在他的文本中生成变异与生长为独特风格的内在理路。读了几部对莫言与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专著，都做得扎实细致，对于我来说是补课，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学荒疏已久，比较而言对莫言的功课则做得就显得单薄，不免有虎头蛇尾的感觉，影响的研究主要的重心应该在莫言的文本。民俗学是从文化人类学分蘖出来的一个学科，历经百余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随着文化人类学的演进，吸纳了最新的科学人文成果，比如两大信息系统的发现与推论等。如果用的理论太旧，得出的结论也会滞后。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博弈的关系，如果你的知识结构滞后，对文本的解读就停留在皮相。

莫言得天独厚，赶上了人类文明的转型，由黑色的工业文明向绿色的生态文明转型，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向图像的急剧转型，他早年乡土生活的经验成为一个物种生物学“强大本能”的巨大能量，而民间艺术的综合性形式与高科技的图像结合，也成就着他感官性极强的语言风格。中国早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季红真（1955-），女，浙江龙泉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的大循环，对此，莫言是有高度自觉的，他说要把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缩影和是世界历史的片段，他的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这个自觉的前提之下，体现为汉语艺术语用的成熟理念——驯化了的方言，这是他弥合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裂隙的语言策略。所以，他的语言风格适应了他所讲述的故事的文化属性，能够成为人文地理与文化历史时间的感性标记。

汉语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与外来语言融合的过程，除了外来语词汇之外，还有外来语言带来的故事，隐性的借用通常是类比的关系，显性的则是戏仿的关系。故事自古以来就在漂流中，有的在时间中漂流，有的在空间中漂流，被吸纳进作家的文本和知识背景有关，也和一个民族发展的文化史阶段有关。莫言几乎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叙事主题，连无意乱伦的故事还讲述了两起。但叙事方式始终都是汉语文学志怪传统衍生出来的神话思维方式，外化在传奇的文体中。上古文化就是巫觋文化，女为巫男为觋，曾经的主流被冲击到边缘，沉入民间，成为能够矫正民族意识偏差的集体无意识，浮现在口语语用中，民间故事是最基本的载体。现代汉语本身的发展也是一部历史，语言文字的变化提示着时间的刻度，比如莫言的短篇《粮食》中女性第三人称是伊，和鲁迅《补天》同，是新文化运动之初、现代汉语酝酿时期的“她”，提示我们这是对《补天》的改写，也是对女娲神话的意义连接。谈到寻根文学，具体地说，贾平凹等作家寻到中国父权制文化的巅峰时代汉唐，而莫言的精神向度则大跨度地寻到父权制文化形成之前。

莫言借助这样丰富的语言资源，完成他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启示，所谓积极的反现代性，对于母语高度自觉的艺术语用承担了他质疑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重要表意功能。他对现代文明三大知识板块都有选择地进行了解构和颠覆，达尔文的进化论、起源于奢饰品贸易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僵化的规范语言系统，而且直抵基本的知识谱系差异，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 / 共生。摒弃了两种知识谱系中各自极端的形态，建立起以生命伦理为核心的现代多元共生的人文精神，回归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整体宇宙观，为危急中的人类提供一维精神的资源。

而这一切无不借助对于母语艺术语用的高度自觉。

在不断探索中建构文学的自信

樊　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新时期作家的文化自信源远流长。当李凖在1979年出版的《黄河东流去》开篇就表白了要寻找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之源时，当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了《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一文时，都开了“寻根”思潮的先河。莫言的“寻根”起步稍晚，却走出了个性鲜明的道路。他在谈及《透明的红萝卜》的文学追求时曾表达过对李商隐诗风的神往：小说可不可以写出水中月、镜中花的境界？其实，在早于《透明的红萝卜》写成的《民间音乐》中，已传达出朦胧、神秘、玄远、幽深的“李商隐风格”。另一方面，莫言写于同时期的创作谈《天马行空》又散发出狂放、强悍、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气息。莫言的复杂性格、多变文风，于此可见一斑。他时而感伤、时而狂放的双重风格值得深入研究。

《红高粱》是莫言的“寻根”之作，也是他天马行空个性与文风的一次成功展示。小说中对故乡先辈率性活法的热烈讴歌、对“匪气”的诗意渲染、对“种的退化”的深深忧思在文坛上产生了热烈的回响。我初读《红高粱》时，很自然就从余占鳌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樊星（1957-），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想到了《水浒》中的武松、李逵、鲁智深，由戴凤莲想到了《水浒》中的孙二娘、《红楼梦》中的尤三姐、芳官，想到了中国文学中远离“温柔敦厚”、狂放不羁、天与行空的那一脉传统。在后来的《红蝗》《半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不断书写出对于天马行空的文心、放浪不羁的民魂的欣赏，虽屡遭非议也不改弦易辙，他性格中的自信也因此得以彰显。

渐渐地，莫言走近了蒲松龄。他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写下的《奇遇》《食草家族》等多篇富有神秘色彩、志怪风格的作品，影响虽不如《红高粱》《丰乳肥臀》，却别有洞天地表达了作家对蒲松龄借谈狐说鬼，或针砭时弊、或猜想未知世界的文心的神往。他曾有专论《学习蒲松龄》，表达了描绘神秘世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显示了莫言对故乡“齐文化”神秘风格的神往与继承，也记录下他生命中难以理喻的神秘体验与记忆。在这一方面，他与贾平凹、史铁生、迟子建、范小青等作家不谋而合。是的，当代有一批作家在追问文化的神秘、世事的神奇、人生的不解之谜方面写出了发人深思的力作。对此，我已写过系列文章作过探讨。如何写出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氛围？古有《聊斋志异》《红楼梦》，今有《白鹿原》《蛙》……

从师法李商隐到学习蒲松龄，莫言找到了一条有独特个性的“寻根”之路。当然，这样的“寻根”与他不断向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学习、兼容并包各家之长的成功探索密不可分。

莫言的“寻根”充分表明：中国的古典文学自有其恒久的生命强力，并在作家富有创造力的师法与借鉴中焕发出新的光彩。而在学习外国文学的思潮不断高涨的当代，从古典文学中感悟超越追逐西潮时亦步亦趋的偏颇心态，显然十分重要。

且看莫言如何不断超越自我、写出富于中华文化特色的新篇章也！

自信：文化的流动

贺 立 华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说到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化自信，使我想起了莫言获诺奖之后，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他说：莫言获得诺奖是中国文学的进步，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进步。[①]管先生的“进步说”，我认为道出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流动性。这种流动的规律是“水往低处流”的，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的，是优胜劣汰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的文化不是仅存在图书馆里的，不是仅摆放在书架上的。中国文化的经典理念，经过千百年的风化流行，早已化作中华民族生活的价值观及其表达，化作人们的心理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它虽然具有超稳定性，但它仍在时缓时急的流动。在流动中扬弃不符合人性的糟粕，在流动中接受新的滋养，而得以跃迁和升华。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呼唤出的以人为本位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创造了一座前无古人的关于“人”的文化的高峰。例如20世纪80年代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再一次发出的“人”的呐喊，创造出了20世纪又一座“人”的文化高峰，改革呼唤出一个崭新的价值天地，人们的目光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对过去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许多传统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其标准和尺度就是“人”，一切彰显着人的主体需求，继“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在追求其当代价值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一场“转化”、“创新”、寂灭和再生。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讲话谈到是“中国文化自信”，而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自信”。我理解这个“中国文化”远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贺立华（1948-），男，山东平阴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参见管谟贤《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147页。

远大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文化”所指，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包括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新文化传统，是流动的中国文化，包含了流动中跃迁升华出的“现代精神”，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摒弃了“斗争哲学”、“冷战思维”而实行的“合作哲学”和具有的“WTO”规则的世界眼光、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作家莫言就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中弄潮、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尽管三十多年来，他的十一部长篇和一百多部中短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批判，但他在质疑和批判声中，不屈不挠依然坚守人的立场、坚守对丑恶人性的批判、坚守对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坚守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成为新时期文化创造的英雄。他的成就和“莫言精神”，终究得到了社会的包容和认可：敏感的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小说《蛙》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而且他再次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发来贺信表示祝贺……相对莫言在世界最高领奖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却更看重莫言在中国国内的获奖，因为它说明着中国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心胸，说明着中国文化的流动，说明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气度和进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文化必将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而且为世界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莫言和中国作家艺术家们，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充分释放自己的潜能，开放出绚烂的智慧之花，创造出人类文明的硕果。

莫言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自信

杨守森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古往今来，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往往会涌动着作家对故乡、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深依恋与自信，并缘此而构成其作品的特有魅力。“尽管你让我饱经苦难，我还是为你泣血歌唱”（《天堂蒜薹之歌》题记），莫言正是以这样一种对故乡的深情，对民族优质传统文化的热爱，创建了他的“高密东北乡”这一已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学王国。在这个色彩斑斓，充满乡土情怀的文学王国中，我们会看到：柔情似水，母亲一般呵护着小黑孩的菊子姑娘（《透明的红萝卜》）；豪放不羁，刚毅不屈，敢爱敢恨的“我爷爷”“我奶奶”（《红高粱》）；兢兢业业工作，痛恨虚假人生，深受学生爱戴的中学物理教师方富贵（《十三步》）；正直纯朴，英勇无畏，面对社会不公与人格歧视敢于豁出性命抗争的棉花加工厂季节性合同女工方碧玉（《白棉花》）；决绝地宣称“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1]的普通村妇上官鲁氏（《丰乳肥臀》）；大义凛然的民间烈女孙媚娘（《檀香刑》）等众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会看到“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2]的“红萝卜”意象；“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3]的“红高粱”意象。仅从这些人物与意象中，就会让读者感受到中华民族嫉恶如仇、坚韧刚毅、正直善良，向往社会公正与人性圣洁的文化精神的光辉，以及莫言对故乡的深情，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充分自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正是赖此精神、情感与自信，薪火相传，自强不息，在苦难与艰险中，从远古走到如今，从如今正在走向辉煌的未来。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杨守森（1955-），男，山东高密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可否认，莫言的作品中，亦更多描写了“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4]的“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存在的丑陋与龌龊，愚昧与粗俗，野蛮与邪恶。如饥饿、贫穷、肮脏的生活环境、人性的压抑等等。在人物形象中，亦不乏昧着良心，制造假药，骗人钱财的四老爷(《红蝗》)；野蛮残忍，将“一根生满硬刺的树棍子”戳进高羊肛门里治保主任(《天堂蒜薹之歌》)；口头上冠冕堂皇，满嘴里马列主义词句，暗中却背着妻子，与“蜡美人”及其女儿李玉蝉私通的王科长，后来的王副局长(《十三步》)；沉浸于食色之欲的政府官员(《酒国》)；有着纯熟的杀人技艺，自得于活儿做得好的刽子手赵甲(《檀香刑》)；有着顽固的恋乳癖的金童(《丰乳肥臀》)等等。正是由于这类描写，莫言自走上文坛以来，就一直颇遭非议，被认为是在迎合西方人歧视中国人的心理，是丑化了中国人，是玷污了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是贬抑了民族文化。这看法无疑有失公允，从整体上看，也不符合莫言作品的实际。

真实可信地描写现实，原本就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原则；揭露与抨击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丑陋与邪恶，原本就是文学艺术的使命之一。故而在中外文学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家，鲜见止于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者。相反，更多见的正是以敏锐的目光，超凡的胆识，着力于批判揭露者。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作品中，不亦深刻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吗？不亦痛切地揭露了国民劣根性吗？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契诃夫的《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的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以及同是诺贝尔获奖作家的萨特的《恶心》、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世界名著中，不也在揭露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痼疾与人性丑陋之类吗？

事实上，世界上无论哪个集团、哪个民族、哪个国度、哪个时代，其文化都是复杂的，都会精华与糟粕并存。因此，一个集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负，不是文化自吹，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妄自尊大，不应只是歌颂不能暴露，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连脓疮也非要说成是艳若桃花。相反，只有“知耻”方能“后勇”，只有揭开疮伤，挑出脓血，才有新生的希望，才能不断发展与进步。由是观之，莫言以赤诚坦荡，无所顾忌的笔触，在歌颂伟大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敢于揭示民族文化中的阴暗面，应可谓更为强盛的文化自信的表现。假若仍像我们的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时段那样，鼓励假大空，推崇瞒和骗，常在刻意粉饰，虚张声势，那倒才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更值得重视的是，莫言所描写的愚昧、丑陋与野蛮之类，并非专就“高密东北乡”的芸芸众生，也不是专就中国人而言的，而深层意图在于揭示某些更具普泛性的人性形态。在《红蝗》中，莫言就曾以超国度、越民族、超时代的目光，如此痛心嫉首地写道：“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人类的语言往往与内心尖锐冲突，他明明想像玩妓女一样玩你，可他偏偏跪在你的膝盖前，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嘴里高诵着专为你写的(其实是从书上抄的)，献给你的爱情诗……”[5]“人类是丑恶无比的东西，人们涮着羊羔肉，穿着羊羔皮，编造着狼与小羊的寓言，人是些什么东西？狼吃了羊羔被人说成凶残、恶毒，人吃了羊羔肉却打着喷香的嗝给不懂事的孩童讲述美丽温柔的小羊羔的故事，人是些什么东西？人的同情是极端虚的……”[5]“人其实都跟畜牲差不多，最坏的畜牲也坏不过人”[5]。莫言这类文字，虽不无偏激，但决非是在反人类，而不过是以文学笔墨，道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原本就脱身于动物，无论如何的进化，其生命躯体中的动物性也不可能根除。与之相关，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历程中，充斥着多重矛盾，善与恶、美与丑、人性与非人性、人道与反人道等总是扭结在一起。从根本冲突上看，人类为了满足生存这一正当的生命需要而实施的杀戮和诡计是无法避免的，但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目的。纵观人类历史，如何处理生存与杀戮之间的生命性悖论，都是考验人类智慧的一道难题，也是一切伟大作品包括莫言在《红高粱》《酒国》《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中直通人类灵魂的深层意绪。早在获诺奖之前，莫言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示“要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认为面对某些方面的社会问题与灾难，每个人都应检讨自己的责任。由这样一种痛切的“自审”意识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在莫言那些被指责为“丑化”了什么，“玷污”了什么的作品中，深隐的实际上正是作为一位文学大家所应具备的超越性的襟怀与视野。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已是为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作

家之一，尤其是获诺奖以来，其作品，已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这本身就极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对于莫言的创作成就与水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曾有如是评价："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6] 莫言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显赫的世界性声誉，其重要原因正在于：他的创作，既立足于乡土情怀，一直是以红高粱大地上的风物人情作为创作源泉，又能跳出高粱地，能够以博大的人类情怀与宇宙视野透视我们的历史、现实与人生；既对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又以其自信，无所顾忌地揭示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方面的沉疴，以及现实中存在的丑陋与邪恶。可以说，正是这些因素，仅在作品的内在意蕴与精神境界方面，就已从根本上决定了莫言小说的世界文学高度。

参考文献：

[1] 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2]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 莫言.红高粱[A].红高粱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4] 莫言.高密之光[N].人民日报,1987-02-01.

[5] 莫言.红蝗[A].食草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6] 刘仲华,李玫忆.专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没人像莫言那样打动我[N].环球时报,2012-10-19.

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

管谟贤　毛维杰

（高密莫言文学馆，山东 高密 261500）

莫言的文化自信首先是他具有独特的文学观念。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用一种哲学、宗教的超脱和宽容，居高临下地概括生活的本质，对人类精神进行分析和批判。他自始至终坚守了自己的文化领地，有意识地捍卫了他的高密东北乡。他深信只有站立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的版图上，讲述中国故事，才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其次，莫言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他丰富的创作实践中，他的多部长篇巨著（《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显示出来的宏大叙事气度、恣肆的语言洪流、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就是一种自信。特别是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采用古典章回体架构形式，吸收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佛教元素，传承古典神怪小说魔幻手法，可谓是向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致敬的作品。这部成功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传播，是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体现。莫言坚信在文学创作中只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地方语言、地方历史故事、地方的人文语境，才可以通达人类共性。才能同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语种的人们产生共鸣。

莫言植根于传统，植根于乡土。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绵延不绝，长盛不衰。有人说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这是不正确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只是少女坐在毯子上飞，而我们先秦时期《山海经》里边，人面兽身、人身鸟首、人首蛇身等等的描写琳琅满目，干宝的《搜神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直到鲁迅的《铸剑》、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食草家族》等等都与之一脉相承。

当然，马尔克斯是了不起的，莫言曾经受过他的影响。莫言说他刚开始连《百年孤独》都没读完，但他受到了启示，知道了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莫言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两座灼热的高炉》，文中把马尔克斯、福克纳比作两座灼热的高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管谟贤（1943-），男，山东高密人，高密莫言文学馆研究员；毛维杰（1966-），男，山东高密人，高密莫言文学馆研究员。

炉，不能靠它太近，太近了会融化了自己，必须赶快逃离。这就说明，不管对古典、对外国，都不能食古不化，不能死搬硬套地模仿，要有自信心建立自己的东西。莫言走上文坛时，碰到了一个好的年代，即20世纪80年代，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国外的东西涌进来。莫言像一块海绵吸足了水分，那时人的思想开放，观念活跃，这些都增强了莫言的自信。所以他才写出了那么多的观念前卫、技巧多样、真实、深刻的小说。

文学即人学，文学是写人性的，而人性是复杂的，有善有恶。莫言说，“我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需要极大的自信才能做到。集善恶于一身的人，文学作品应该抑恶扬善，制度、法律应该惩恶扬善，普遍提高国民的自信心。当然，人的自信、人格的尊严必须建立在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莫言的作品中多次写到相貌美丑，吃相好坏，城里人的傲慢和农村人的自卑，但都体现了自信。饿着肚子是不能讲什么自信和尊严的，谈论自信和尊严是在吃饱肚皮之后的事。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人，写小说就是编故事，编故事就是写小说。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这篇讲话就充满了自信心，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文学的自信心，可惜的是，对这篇讲话中莫言讲的三个小故事，没有人关注，少有人做出正确的解读和阐释，这三个小故事也体现了怎样看待自信心的问题。这正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东北乡里说书人。”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当作自己的文学王国，自称是这个王国的国王，这要有多么大的自信力。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极大肯定。当今世界颁发的文学奖项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诺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更加认可中国文学的价值，这也让中国文学找到自信。这个在中国文坛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中国文化自信力回归的显著标志。

莫言：生命的诗性

孙基林

（山东大学（威海） 现代诗歌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记得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于一次答记者问时说过：“莫言热”或许也就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就会冷却，一切会归于平静，回到正轨。确如所说，那种几近于全民执议热炒，或批评或赞赏，甚至一味追捧、仰视的热烈程度自然不久便会褪去，一切回到自在常规状态。然尽管如此，事实上在知识界，在学术界，对莫言的热情、关注或者对他的期待却一直未从消减、停止过。所以当近期莫言重又携诗歌、戏剧和小说等作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很快便得到文学界及社会大众的群体关注并形成小小的议论热潮。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国人内心最深挚的文化关怀，最强烈的世界文学之梦和浓重的诺贝尔情结。这一关怀、梦想和情结于今终于借助于莫言的获奖而得以实现，而莫言由此也得以风云际会，历史性地成为一个节点和符码，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样本和典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莫言获奖甚至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事件，它不仅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获得了更多的能见度，更重要的是它构建和铺就了中国文学及文化走向世界的平台、路径，使中国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学及文化产品赢得了某种身份和更为强大的自信度。就此而言，它的意义是不同凡响的。因为曾几何时，我们曾自惭形秽过，也曾以一种反向的方式，极尽嘲讽与批判，但最终不论以哪种方式，都无法让中国文学离世界文学更近或进入世界文学的视域之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孙基林（1958-），男，江苏丰县人，山东大学（威海）现代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这百年来似乎恒定的格局由莫言来打破，其意义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具有现实价值。尤其莫言作为这个时代作家群体的代表，他的书写体现着这个时代的艺术水准和进入世界文学的思想、审美高度。

当然，“莫言书写”是一个写作符号和个案，它充满着的中国文化自信源自传统与现代文化资源及个体生命的定力，这首先体现于莫言书写的个别性上，而这种个别性又与普遍的人类性、种族原型及时代性、存在经验同构于作品文本之中。就我的阅读经验，“莫言书写”的个别性中一个重要的维度，体现于迎面而来的感性生命的解放和诗性语言的狂欢，它似乎在时刻提醒和说明，莫言是一位小说家诗人或诗人小说家。有一种批评说，莫言没有哲学、没有思想，而这恰恰是诗人小说家的本性所在。因为诗、小说从来不是去表现思想，诠释哲学，它是显现和感悟。如果说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对莫言书写给以聚焦和评判的话，我觉得“生命的诗性”是最应该被关注的一个。当然由此可衍生出许多相关的语汇，比如“生命本体”“生命力”“生命意识”“生命哲学”等，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在新时期被彰显出来的一个价值基点，也是人的哲学的终极归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人的主体性被遮蔽、湮灭的漫长时期，人成了无灵魂、无生命的一个躯壳。在没有人的时候彰显和召唤人的主体性及大写的价值，这是文学曾经有的使命和责任，五四和新时期文学曾响应这个要求，成为文学现代性无法抹去的篇章。但人毕竟是具体的有血肉的个体，随着大写的人的哲学的终结，文学也开始回到人的具体生命本身，“莫言书写”所显现的便是回到生命本身的诗性哲学。这里既有对“我爷爷”“我奶奶”那种本然、原样生命形态的呈现以及强悍、粗犷一类原始生命力的揭示，也有对漠视、戕害生命和异化生命的批判、忧患，比如《蛙》等。莫言书写中的生命元素，还有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内在驱动力，比如饥饿、疼痛、孤独等生理、心理状况，这些均是生命的基本元素，正是这些驱动他走向文学书写，使文本弥漫着生命的原始感觉力。除此，还有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关键词：“高密东北乡”，它已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构成了文化原型和集体记忆，成为人类生命的原乡或存在场域，尤其那“蓬勃旺盛的红高粱，更是成为了乡下人原始野性和旺盛生命力的象征。”莫言最懂得事物存在的辩证法和真相美学，他不追求纯粹和完美：“这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所以他的生命样态和“高密东北乡”是真相现实主义，虽然有些迷幻，但并不导向乌有之乡或虚幻的乌托邦，而导向真实的存在主义，这是莫言也是我们在这里得以安身立命的真实的原乡。

所以，正是这本源的“生命”和“原乡”——“高密东北乡”，构成了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的本质元素，我愿以此作为理解这一话题的切入路径，对此给予进一步观察和探讨。

以“莫言”的方式研究莫言

张瑞英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首先，莫言，文坛的一个“异数”和“变数”

莫言自出道以来以其天马行空的思维，信马由缰的表达屡屡在文坛“爆炸”，震惊同行，引发争议，也令研究者无所措手：运用已有的文学理论、价值标准和文学规范这些批评的常规武器既无法厘清其创作路数，也找不到安放他的合适位置，寻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张瑞英（1965-），女，山东高密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先锋、新历史、新写实、魔幻……似乎都不能恰当概括其创作特点，也无法涵盖其思想内涵。直至今天他仍然是文坛的一个异数，而且还是一个变数。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风格问题，它是一种文学现象，对于这种现象，该如何评价？

在一次访谈中，莫言曾经这样给自己定位："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学者型，还有一种，像台湾说的，叫素人作家。我更多的还应该是素人作家，靠灵性、直觉、感性和生活写作，不是靠理论、知识写作。"[1]（P143）而且认为，"有很多好的小说实际是'素人作家'写出来的，'素'就是朴素的'素'，是跟一个评论家学来的。中国大陆有很多素人作家，他们没有受太多学院式教学，没有受过规范的理论训练，他们就是从他们的直感甚至生理性的感触出发。"[2]（P132）

素人作家的自由写作，或者说性情写作，用常规的专业的理论和文学规范来评价，自然不会合适，"具体问题"还是应该"具体分析"。

其次，莫言的感觉与悟性

有研究者曾这样谈莫言的感觉："如果你把一件东西放在其他作家面前，他们可能只是沉着地细心地观察它、赏析它或思索它，而莫言却必然是忍不住去触摸它，用舌尖品尝它的滋味，用肌肤感觉它的质地……然后，他告诉我们的将不是这东西是什么，而是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在他的每一桩故事前，都只寻求直觉，也就是那种比事实本身更可靠的主体悟性。"[3] 感觉与悟性是莫言认识世界与表达自我的主要方式。莫言似乎总能调动自己的一切感官肌能与这个世界交流对话，以自己多角度、多层面的感觉来体味周围的一切。正是这份感觉和悟性，他"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经过想象编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4]（P57）。

再次，莫言的"我向思维"

现实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历史就是远去的现实。"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越是久远的历史，距离真相越远，距离文学越近。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者，为了感染他的听众，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5]（P83）无论是历史故事，还是现实事例，作者都以我的感觉，用我的思维方式去讲述。在他眼中，文学创作最初直接的动机是能一天吃上三顿饺子；真正的动机是有话要说，想说真话。文学于他而言，是不能已于言的生命书写，所以他的创作，都是"写我、传我、达我"。

峪丛在《走近莫言》一书中记录了莫言关于小说的"朴素的理论"："我也曾经多次狂妄地给小说下过定义：1984年，我曾说小说是小说家猖狂想象的记录；1985年，我曾说小说是梦境与真实的结合；1986年，我曾说小说是一曲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1987年，我曾说小说是人类情绪的容器；1988年，我曾说小说是小说家精神的生理切片；1990年，我曾说小说是一团火滚来滚去，是一股水涌来涌去，是一只遍体鳞伤的大鸟飞来飞去……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有多少个小说家就有多少种关于小说的定义，这些定义往往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都具有模糊性因而也就具有涵盖性。"[6]（P95–96）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是对小说或一方面的描述，这些描述都是基于对自我感悟体味思考的结果——是一个素人作家的感觉和感悟。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莫言曾说，小说的"事件只是一个框架，而支撑着这个框架的，是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我自己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有了这些东西就能让人体会到小说中的感情。"[7]（P295）小说的事件是一个框架，人物才是要表现的核心。其实，在莫言的小说中人物也是由年龄、身份、性别、职业等多限具化的一个灵魂栖息之所，他真正要表现的是莫言式的灵魂，支撑莫言式灵魂的就是其对生命的感觉。

灵魂必须寄寓在有形的肉体之内，这是人生的实相。人物需要有展现自我的舞台，这是文学的常规。在莫言的小说中，作为框架的故事可以千变万化，作为外壳的人可以千差万别，但灵魂却是莫言式的。这不仅表现在小说中，也表现在他写的电影剧本、舞台戏剧中。在谈到创作《我们的荆轲》时莫言说，"我不想按照传统历史剧的套路来写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解构它，并且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来讨论他。"[8]（P189）即使在传统的故事框架中，在原有的故事情节内，莫言也要自己心中的故事，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荆轲，我怎样用严密的推演，把我心中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别人看了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9]（P189–190）剧本中的太子丹送给荆轲的宠妾燕姬说："这世上的人，有几个知道自己是谁？"[8]（P72）现实中，每个人对自己能确定的只是个壳：由身份、职业、地位、年龄等形成的壳。至于自己的灵魂、意识、潜意识都是在探索、发现中不断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小说都是成长小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莫言说他的写作意义，就是让自己成为

一个比较好的人。《我们的荆轲》中，莫言没有过多地虚构故事，而是在原有的故事情节内，“往人物灵魂深处写”[10]（P200）。

参考文献：

[1] 莫言. 我写农村是一种命定——莫言访谈录[A].《南方周末》主编.说吧，莫言[C].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2] 张清华，曹霞编.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3] 李洁非.回到寓言——论莫言及其近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3,（2）.

[4] 孔范今等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5] 莫言.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粱地里[A].高晓春.有理想就有疼痛[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6] 峪丛.走近莫言·朴素的理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

[7]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与大江健三郎、张艺谋对话[A].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录集[C].海口:海天出版社,2007.

[8] 莫言.我们的荆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 莫言.莫言采访之一——解密《我们的荆轲》[A].我们的荆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0] 莫言.莫言采访之三——《我们的荆轲》是一部解构侠义的戏[A].我们的荆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文学借鉴”与“文学创造”

——“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之我见

李 萌 羽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0100）

“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这一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也关系到如何客观评判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它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增强中国文化自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目前中外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贬褒参半，如“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的说法曾一度引发了热议，很显然，这一评价暗含中国当代文学低于现代文学的价值判断。当代作家残雪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也持相对否定的态度，她说“不可否认，80年代至90年代，大家都写过一些好东西。但拿到今天来看，那种‘好’是很有限的，无论是情感积累还是文化积累都很稀薄。”[1]此评价显然带有一定的偏颇性。而这种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调其实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文学评论界及媒体就非常盛行，鉴于此，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等学者竭力捍卫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他指出：“如何评价1949年（或更早些1942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是如何给出文学史的和文学价值的评价，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难题。”[2]他认为新中国建立60年来，目前“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在对“当代中国汉语小说的几点肯定”部分，他以莫言为例，高度评价了其系列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2]

纵观莫言的文学创作之路，他的成功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其对国外文学及思潮尤其是西方文学及思潮的积极的借鉴与学习上，这使得他的创作在对现实、自然、人生、人性表现的广度、深度以及艺术创新上保持着与世界文坛的同步。另一方面莫言在借鉴国外文学的基础上有着很强的创作主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李萌羽（1968-），女，山东日照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体意识及文学创造力。对世界文学的借鉴，为他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使其获得了一种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关注的目光，他的诸多作品立足本土，立足于传统，发掘高密东北乡的民间文化资源，表现集体民族无意识，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宝库。

毋庸置疑，莫言对国外文学的借鉴是多方位、多层面的，就东方文学而言曾受川端康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西方文学中则受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较大的影响。莫言和福克纳一样是一位文体感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所尝试使用的意识流、多角度跳跃性叙述、书信体、戏剧体潜入文本等文体实验策略，拓宽了其表现空间，这与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手法的借鉴是密不可分的。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地理世界的建构也受到福克纳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较大影响，在2003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演讲中，他特别提到福克纳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令他“心驰神往”。从一定意义上说，福克纳的这枚“约克纳帕塔法”文学“乡土邮票”唤醒和激发了莫言等中国当代作家对乡土价值的重新评估和认识。

然而，我们看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借鉴和模仿，莫言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比作两座灼热的火炉，把自己和其他作家比作冰块，担心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这种影响的焦虑实际上预示着莫言一种主体创作意识的觉醒。觉醒之后就是摆脱了这种影响的焦虑，建构了自我创作主体性，因之，正如他在此文演讲的后半部分所谈及的，他承认福克纳是他的“导师”，但在与福克纳的相册对话时他也自信、幽默、风趣地列举了他超出福克纳之处，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个县”，而他“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他的“高密东北乡”[3]。因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书写更是一种文学创造，这一文学地理世界不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这使得莫言创作站在了与中外作家同一个地平线上，他从“高密东北乡”出发，其作品超越了故乡，具有了世界性。譬如莫言的短篇小说《大风》堪称其短篇小说的精品，小说取材于童年时期和爷爷的一次割草的经历，对这一乡土生活经历的书写既有一定的现实性，又具有深远的隐喻性。在割草的途中，爷爷吟唱起了苍凉、悲壮的民谣，在空旷的原野上，“爷爷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前行”，我从爷爷的歌声里“感受到一种很新奇很惶惑的情绪”。小说的歌声令人想起华兹华斯的名篇《孤独的刈麦女》，那孤寂的女孩，一边割麦子，一边吟唱古老、忧伤的曲子。这些歌声有对艰辛生活的宣泄，但却更指向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孤独与苍凉。他们割的草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席卷而去，只剩下一根挂在车轴上，这一细节描写则带有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它，但就是打不败它”的悲壮。这样一种结局又令人想到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故事所蕴含的人类永恒的困境以及人类比石头更坚硬的意志，即加缪所进一步阐发的人类所面临的荒诞的命运，永无止境的苦役以及在荒谬、严酷的现实中知其不可为之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这样一篇反映“高密东北乡”农民生活的小说也便具有了与世界文学的通约性。

最近我和研究生一起翻译完成了两篇美国福克纳研究专家关于福克纳和莫言等中国现当代作家比较研究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为国外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福克纳研究专家罕布林教授及瑞格博士所写。前者的题目为《国际化的福克纳——兼与苏童、沈从文、莫言、余华创作的比较》①，后者的题目为《从密西西比河到高密东北乡：福克纳和莫言笔下的战时历史》②，从中可以看出在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中，莫言等中国现当代作家也已被放置于与福克纳等西方经典作家平等位置上进行比较研究。今年暑期我参加了伦敦玛丽女王学院举办的文学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英文论文“莫言《丰乳肥臀》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性伦理取向比较研究”，也旨在向国内外学者强调莫言影响的世界性，以及在世界文学坐标上与福克纳同等重要的地位。

贾平凹对莫言作品的阐释有一定的启发性，他认为莫言的小说兼具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这是莫言小说的文化意蕴及审美价值所在。没有传统性、民族性做肌理，莫言的创作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现代性因子，莫言的作品就会

①罕布林《国际化的福克纳——兼与苏童、沈从文、莫言、余华创作的比较》，李萌羽等译，载《东方论坛》2017年第3期。

②瑞格《从密西西比河到高密东北乡：福克纳和莫言笔下的战时历史》，李萌羽等译。载《莫言文学研究》，山东友谊出版社2017年出版。

流于简单化。其实莫言的作品的开放性还远不止于此，从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意识流、解构主义、生态批评等视角都可以进行多维度的阐释，莫言创作立足于本土，胸怀世界，其作品意蕴的丰富性，形式探索上的创新性无疑是他建构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

参考文献：

[1] 残雪.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N].南方都市报,2006-12-20.

[2] 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N].羊城晚报,2009-11-09.

[3] 莫言.用耳朵阅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文化自信：与“自我”和“他者”的对话

——以莫言及其文学世界为例

丛 新 强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全球化的本质并非“一体化”，而是“对话性”。“全球化”并不悬置“主体”，而是极为强调“主体”存在本质的“主体间性”（或者直接说，“主体”本就是“主体间性”），也就是说，一主体同时为其他主体所介入、所构成，否则就无所谓“主体”。主体的有限性所决定，“他者”与“自我”都可作为他者来考察对待，由此，“对话”成为“全球化”的题中之义，并进一步衍生了“与谁对话”“如何对话”的基本命题。“与谁对话”这一层涵盖了与“自我”对话、与“他者”对话的双重维度。就前者而言，是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在后者来说，就是对异己文化的理解。而且，“自我”与“他者”本身就是“互为主体”。正是由于“他者”的无限性，“他者”就具有了“真理”和“方法”的参照功能；另一方面，“自我”只有在“他者”的考量中才能被认知，从而获得更新发展的可能。至于“如何对话”，则必须同时持有对“自我”存在的反思以及对“他者”身份的尊重这两方面。如果从上述意义进行考察，莫言及其文学世界本身及其所发生的“文化自信”，恰恰来自于与“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多层面对话。

以《红高粱家族》为例，其实已经奠定了莫言同时面向“自我”和“他者”的“对话性”特征。依据这样的视点，莫言恰恰走出了一条融合“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特质并进行创新性突破的写作之路。《红高粱家族》体现出鲜明的先锋因素。首先便是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在历史叙事和时间叙事层面呈现出交错往复的姿态。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线性逻辑，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幻觉、内心与环境之间随时随地穿插和闪回，糅合了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的诸类元素，进行主观性的切割，天马行空，自由不羁。其次，大量运用通感、象征、意识流的方式表现人物和事件。第三，最为人称道的先锋质素还来自叙事人称和叙事视角的变化，即“我爷爷”“我奶奶”等作为叙事人的出现。莫言自称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却呈现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诸如此类的“他者”元素，在莫言此后的创作中一直延续，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转换。

《红高粱家族》的“先锋”元素又并非独立运用，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和民间生活结合在一起，也就自然避免了“先锋文学”一味地沉浸于形式实验的倾向。这里的“民间生活”适逢其时，正好呼应了“寻根文学”的主体诉求和主题倾向，表现出“寻根文学”的某些质素和某个侧面。其实，小说在一开始就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现代社会的“进步”，却加剧着“种的退化”，迫切需要重新找寻那曾经的“文明”之根。结尾进一步呼应了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丛新强（1974-），男，山东临朐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篇，再次呼唤那高粱精神的回归。或许，“回归”才是前进之路，“回归祖先”才能找到个体和民族的精神之根。作品恰恰以其“红高粱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有意无意地呼应着其时正热的“寻根文学”，不仅是文学的“寻根”，也是文化的“寻根”。在此后的创作中，莫言其实也一直沿着“民间文化”这样的“自我”元素继续拓展，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转换。显然，《红高粱家族》的创作及其延伸，正是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对于其时乃至延续至今的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争论不休，莫言走出了一条具有超越性的“对话”之路。

从莫言的阅读接受角度来看其创作，除了蒲松龄，莫言最为欣赏的就是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此外的古典文学方面一再提及的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史记》等。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莫言较为认同的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赵树理、金庸等。尤其是鲁迅，对其精神影响广泛而深刻。在世界文学方面，莫言提及的名字就更多：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肖洛霍夫、拉甫列涅夫、布尔加科夫、巴别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加缪、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劳伦斯、普希金、塞林格、但丁、略萨、帕慕克等等。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文学精神在莫言这里都有所吸收，成为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成就其独特的主体意识。或者说，正是通过与“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多层面的“对话”，成就了莫言及其文学世界的“文化自信”。

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对话”，对话的主体特征就是互为主体。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民族性”本身就是“世界性”。“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即在于与“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莫言及其文学世界的意义其实也在这里。

文化自信·本土化·全球化

宁　明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文化自信源于对本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和欣赏，当然传统文化并非仅指古典文化，更应包括现代、当代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同时，文化自信也并非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而是一个逐渐对其认可的过程。莫言的作品植根中国本土文化、接续中国文学传统，融贯中西、连接古今，其文学作品的流变和海外传播与接受恰是中国文化愈发自信的体现。

一方面，莫言的文学创作路径就是对本土文化愈来愈欣赏的历程。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时的作品，如《春夜雨霏霏》《岛上的风》等还有很多革命文学和红色文学的印记，接下来的《售棉大道》《民间音乐》等作品则是借鉴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的结果，及至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十三步》等则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在自己的作品中付诸实践，延至《檀香刑》则成为向中国本土文学传统致敬的标志性著作，但仍将复调叙事等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融汇其中，使其成为一部中西汇通的经典之作。

另一方面，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也是中国文化逐渐被认同、接受以至欣赏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为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不断努力。自1951年起，《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出版了590期，自20世纪80年代起推出“熊猫”丛书190多种，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即便如此，中国文学在海外的销量仍十分微小，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海外文化交流愈加重视，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也逐渐走进了海外读者的阅读视野，莫言作品的外文译本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宁明（1973-），女，山东临清人，文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遭遇也反映了这一点。

在美国，莫言作为获奖电影《红高粱》原作者的知名度、其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屡获大奖、翻译者的影响、作家重视对外交流等因素都促进了其作品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但是，通过读者的书评和研究者的评论等还是可以清晰读到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从陌生到认可、接受的脉络。此外，在同中国地缘、文化都接近的东亚文化圈，莫言作品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可是因为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和一贯对中国文学“重古典、轻现代”的做法都致使莫言作品未能对日、韩作家的创作产生明显影响。而在越南，则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欣赏，莫言作品不仅被较广泛接受，而且影响到了许多青年作家。如小说《丰乳肥臀》就直接影响了作家阮玉姿、杜黄耀等的创作。在俄罗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被译介出版，但此后，则陆续出版了《酒国》《丰乳肥臀》等承载中国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的作品，而且得到了众多好评。

由此可见，很难确定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成就了莫言，还是莫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自信绝不是对本土文化的盲目推崇，而是要植根本土，认可“异质文化”的存在，并逐渐接受和欣赏它。对“差异性”的接受应该是文化自信、文化成熟的最佳体现。

莫言文本宗教意象的思考

刘 广 远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莫言文本中有许多宗教意象，这里蕴含着文化思考。其中，他写的寺院就是神祇的住所。由于寺院与世俗社会在性质和功能上是相异的，再加上寺院所处的空灵清雅的自然人文环境，寺院总被看作是挣脱世俗泥淖纠缠、获得灵魂净化的人类存在之安然避世之所，而对于某些出乎个人意志或被迫意愿的人，寺院是退隐之所。虽然这只是相对的存在方式，毕竟寺院之内与寺院之外也就是一面真实的墙壁或者一层乌有的魂灵。法国思想家皮埃尔·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一书中说，“希腊的神庙不好说是一个信徒们聚集的崇拜地点，它更是一处住所：神就住在那里，但这是一个再也没有了任何私有性质的住所。它不像人类的家（oikos）那样，封闭在一个家族的内部，神的家是向着外部开放的，朝向公众的。在人的宫殿中，壁画装饰着客厅内部；而在神庙中，雕塑出的檐壁都在正面，直接朝向从外部观看它的人。在建筑的中央深处是神的尊位。但是，这是从此属于整个城邦的一种神：它为他建造他的屋宇，与凡人的住所分开，同时，它又为他远远地造一个卫城，矗立在下城。因为神本身是公共的，神庙的内部也不比它的外部更属于什么主人。神不再成为他所居住之地那个房东的一种特权符号，他以直接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方式显示出其存在：在城邦的目光底下，他成为形式与场景。”[1]（P356）在莫言的小说中，往往会出现与民间社会形成对照关系的“神权”社会，例如寺院、教堂等这类空间。

莫言对于寺院的选择是有意而为，表明创作主体的希望、内心的期望，然而，这种文化选择确是值得商榷。《丰乳肥臀》里面上官金童到教堂谋个差事；《四十一炮》中“肉孩”罗小通到废弃小庙向归隐的大和尚寻求帮助。无法适应这个动荡社会的上官金童与挑战现实社会（《四十一炮》的“老兰”象征着世俗社会）而不得的罗小通最后都选择了寻求“皈依”，他们对社会是失望的，同时，社会对他们是抛弃的。无论上官金童还是罗小通，作为文本的主人公是需要成长环境的，然而，拒绝长大与成熟、拒绝藏污纳垢的社会与融入污浊的社会，他们的选择都是寺院。然而，寺院并不能提供最后的归宿，不能容纳其思想和灵魂。神权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对称性形象，它并非人类的理想国；寺院经由创作主体的虚构处理，成为某种臆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刘广远（1973-），男，辽宁朝阳人，文学博士，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想的另类世俗社会模式。无论《红蝗》,还是《丰乳肥臀》,都与《四十一炮》一样,宗教场所的神圣、尊严、高尚都在世俗的侵染之下,变成污浊不堪、腐化堕落的场所。荒诞与真实并存,比世俗社会更加等而下之的丑陋现象在宗教圣地肆意生长,而所谓纯净与高尚,都在创作主体积极的消解手段中崩塌无存。

寺院的主人们同样以不尴不尬的形象出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和尚端坐在破败不堪的五通神塑像前一个腐烂的蒲团上,神情安详, ……身上的袈裟,仿佛是用雨中淋过的草纸做成,似乎动一动就会变成碎片……大和尚的两扇耳朵上,落满了苍蝇,但他光溜溜的头皮上和他的油腻腻的脸上却连一只苍蝇也没有。(他)眼睛半睁半闭,探出鼻孔约有一寸的那两撮黑毛,宛如蟋蟀的尾巴微微颤动。”[2](P1)如此设置,令人想象,《四十一炮》里的大和尚、《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虽然都是宗教的代言人或者是宗教的世间传承者,无论是中国的“神”,还是西方的“神”,其尊严和圣洁都已遭受了摧毁性的解构。这样的故事在文学文本中是数不胜数的,如《十日谈》《初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和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等。

宗教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已经世俗化,庸俗化,甚至妖魔化,尽管这种文学案例并不是全部,然而宗教中教徒的庸俗欲望的彰显与奢靡思想的存在也是事实,所以,民众对待宗教的态度是谨慎和犹豫的——尤其是苛刻求严的审视者,对宣称至真至善至美的“彼岸世界”持怀疑和诘问的态度。

神到底从哪里来?神是什么?凡俗民众一直追根溯源。鲁迅对宗教的负面效用有如此解释,1925年鲁迅就说过:“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3](P55)后来,鲁迅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的愚民之术。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而这种颠倒的意识如何被神职人员利用并且发扬,宗教各有自己的施教之法,而内心迷茫或者躲避世俗的民众则无法逃避其物质诱惑或者精神引导。

无论寺院的存在,还是神祇人员的存在,还是高不可攀的神或佛,都是宗教的需要而存在。而现实文化的需要,则是个人奋斗或者脚踏实地,当然,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并不是全盘否定宗教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从莫言文本的存在去思考宗教的被亵渎和被“去神圣化”,这种文本的存在对宗教是一种哲学的思考,同时,也打开思考研究对象的无限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让-皮埃尔·韦尔南. 神话与政治之间[M].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莫言.四十一炮[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3] 鲁迅.华盖集·导师[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莫言小说的“常变”与“不变”

王西强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不管学界专业研究者和对莫言保持持续关注的普通读者在评价莫言小说的艺术价值时所选取的批评立场和使用的定位话语如何不同,大家在谈到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主题和形式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创新”“求变”“探索”“试验”等字眼来概括莫言对于小说表现形式创新和作品主题深化的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

莫言小说的形式创新主要表现在叙事上的求新求变。莫言自身对小说叙事理论有深入的阅读、深刻的理解,在写作实践中不断体会,并积极地通过叙事视角的变换和人称机制试验进行着叙事层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王西强(1978-),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面的创新。熟知莫言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都讶异于莫言对于叙事创新探索的持续热情和在他创作谈中论及叙事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叙事学理论的精通与熟稔。莫言在叙事试验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常变”与“不变”，“常变”的首先是叙事方式方法，即叙述视角和人称，莫言先后使用童年视角、创造性地使用“我爷爷”“我奶奶”等复合型叙事视角、“物视角”等来拓宽了叙述者的视域和知域范围，通过单人称内聚焦（“我”“你”“他”的使用都有代表性文本）、频繁复杂甚至极致（极端）化的人称转换（内聚焦和外聚焦高频转换）、创造性地使用“类第一人称”“我—你”人称对话等方式自由地安排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营造出了“我向思维叙事”、多重话语复调叙事、深浅叠加的双层叙事结构、狂欢化叙事、元叙事、“对话叙事”和“寄居叙事”等叙事模式，使莫言几乎每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在叙事上有不凡的表现。

莫言小说在叙事上的“不变”是他从短篇小说《秋水》就开始努力营建的叙事空间——“高密东北乡”。莫言将他几乎所有的故事、人物和对现实的关怀情绪都放置到“故乡”的文化和精神语境中来书写，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想象的故乡”——一个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故乡”，这一叙事空间使莫言在“故乡”中找到了叙事场域和叙事激情。“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叙事场域中的重要板块，代表着一方独特的风土和人情，在文学叙事空间和文化指代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莫言作品形式的“常变”与“不变”，非常典型地表征了他在文学创作上从最初的“不自信”逐渐走向强大的“自信”的过程。莫言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向西方文学叙事新潮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学习借鉴，学习的痕迹在在皆是，对学习对象的超越和创新则构成了莫言小说形式美学的主体。所谓“最初的‘不自信’”，是指莫言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内心深处对于“文学崇高”和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之间落差的惶恐和“不自信”，甚至可能包括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路数而产生的对于其自身文学创作才能的质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哥”管谟贤的指导和鼓励，是莫言应对这些“不自信”的强大盾牌，正是在大哥的指导、鼓励和帮助下，莫言很快就走出了“不自信”的阴影，蹒跚着登上文坛。需要申明的是，莫言的“学习西方”，并非因为“不自信”，因为“不自信”的学习只会导致简单的抄袭和模仿，莫言很早就宣称要“天马行空”，并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迪下，迅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文学叙事空间和叙事模式，不断超越自我、创新求变。正因为莫言相信自己可以超越学习对象，所以才不断向西方学习，学习也因此成了他“自信”的一种表现。

莫言作品的主题也是“常变”与“不变”并存。“常变”的是每一部作品主题的历史感或现实针对性都很强，莫言在小说里关注过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问题（《天堂蒜薹之歌》和《奇死》等）、城市人的欲望与绝望（《酒国》和《红树林》等）、生育问题（《爆炸》和《蛙》等）、士兵和烈属待遇问题（《战友重逢》）、男女间的情感困惑（《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和《怀抱鲜花的女人》等）、改革者的遭际（《球状闪电》《四十一炮》《丰乳肥臀》和《蛙》等）、民族文化的“种”与“根性”（《红高粱家族》《生蹼的祖先》和《檀香刑》）、教师待遇和生存困境问题（《十三步》和《欢乐》）等，莫言不仅关注现实中“人”的生存和精神焦虑，还密切注意“人”在历史和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身体与精神世界的变化。必须要申明的是，细究之下，上述对莫言小说主题的归类都会失之偏颇，因为莫言小说的主题并非明确的、单一的，往往是朦胧的、多义多指的，内涵丰富且随着作品中故事的推进而在主题上有所变化，与主题的多样性相对应的是莫言笔下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丰满立体。在莫言小说所表现的种种“常变”的主题之下，“不变”的是他的一腔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怀，无论主题怎样变化，无论莫言在文本中使用了什么样的叙述腔调，他对“人生”之难的书写都保有高度的热情，并且不断使用各种方法来调动读者在阅读时的“情感代入”，使作品里充满“老百姓”的心声。莫言的作品里对于“苦难”和“焦虑”的书写要远远多于对“欢乐”和“幸福”的书写，究其原因，是莫言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焦虑，是他作为一个内心充满悲悯情怀的“诗性”作家对于“未来会更好”的信心常在。莫言小说文本世界主题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立体感及其浓烈的对“人”的关怀和叙述情感的丰沛充盈，正表现了莫言在表现世界和表达现实关怀时的“自信”，那种什么主题都可入我笔下、什么情绪都在我心中的写作状态，若不自信，其自何来？

2012 年 10 月，莫言站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最新发展和最高成就接受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那一刻，莫言自信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那么，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因素成就了一个怎么样的“文学莫言”呢？在莫言长达二十年的农村生存经验中，童年孤独的言语禁闭造成了他强烈的话语欲望，童年时的耳朵阅读经验为他的小说叙事提供了丰富

的故事资源储备；文革时代的社会语言暴力和文学语言政治化所造成的社会性“煞有介事”的话语腔调，对他的小说叙事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向民间叙事话语传统和西方小说叙事新势力的借鉴，以及莫言出众的感悟能力和强烈的创新欲望，使他不断求新探索，并总有骄人收获；大胆的理论探索精神、高涨的创作实践热情、系统的理论修养和广泛涉猎中外文学经典名著的阅读经验，为他的叙事探索提供了广阔的世界性文学视野；超常敏锐的感觉能力和天才的想像力，让他的小说叙事具有了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气。这几种艺术因素的合力作用共同孵化出了莫言小说的以下几种美学风格：众声喧哗的杂语交响、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煞有介事的叙事腔调、天马行空的意象交织、泥沙俱下的语言浊流、深沉刻薄的思想能力、亲切真实的民间立场、模糊朦胧的文本表意。

接过“讲故事”的薪火

——从蒲松龄到莫言

喻晓薇

（武汉轻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2012年12月7日17点30分，当莫言站在瑞典文学院的报告大厅里向世界自信地宣称：“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时，我们的思绪不由自主地便回溯到三百年前的另一位山东籍“讲故事的人”蒲松龄那里。巧的是，蒲松龄居住的淄川蒲家庄距离莫言的高密故乡不到两百里。同属齐文化圈，都有谈鬼说狐讲故事的民间传统，可以说两人的文学才华都是从这样的文化土壤里孕育出来的。

三百年前的蒲松龄是一个纠结于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之间的复杂矛盾体。一方面，他遵从性灵深处的呼唤，执着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修订与增删，于其中挥洒他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受制于那个时代读书人科举入仕的正统文化价值观，一次次地走进科场。一方面，《聊斋志异》的成功令他在山左声名鹊起。由于“聊斋”效应，县令汪如龙、张崌待他礼遇有加，张崌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尤值一提的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令“布袍萧索”“冷雨寒灯”中苦著“聊斋”的蒲松龄有“春风披拂冻云开”之感——这些都从外在更进一步坚定了他对毕生追求的文学事业的信心。另一方面，一次次的科场失利也一点点地蚕食鲸吞着他从“聊斋”那里建立的文化自信。在蒲松龄内心，根源自文学的自信与肇始于现实的自卑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搏弈，这位身后留名千古的大文豪几乎未有平静舒心之时。也因此，他从“聊斋”而来的文化自信始终被由科场失利而生的文化自卑禁锢，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莫言对这位前人各方面都推崇倍至，唯独一点——对科举制未能看穿、未能忘怀颇有微词：“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婉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1]实际上，设身处地地想，任何一位受过正统教育的普通读书人在那个一元价值观的时代，要超越读书人须仕进有为，修齐治平的儒家主流人生价值观决非易事。在文学创作方面有超拔天才的蒲松龄在科举入仕方面观念流于平庸，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综其一生，蒲松龄的悲剧是个性主义的悲剧，是一个文学天才无法与世俗价值观融合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先锋的文化选择与那个时代一元文化生存方式相左的悲剧。

莫言面临的情况很不一样。首先，在他初登文坛的年代，小说创作早已不是“小道末技”，延续了梁启超所呼吁的“小说新民观”，当代文学中的小说创作被纳入主流文化，成为“经国之大业”，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喻晓薇（1974-），女，湖北武汉人，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在某种范围内甚至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新时期初的文坛，作协体制内的作家同时也是国家干部，文学事业与主流价值观可以融合。其后，在1980年代中期，一体化社会解体，文学创作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急剧边缘化，但与此同时，作家也迎来了一个开放的、多元价值观的时代。因此，在莫言那里蒲松龄式的文化矛盾几乎未对他造成困扰。莫言所面临的主要文化困境是全球化时代经济上欠发达，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影响如何摆脱焦虑，找准自我定位，重拾民族文化自信的难题。这是一个自19世纪中叶就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文化课题，一百多年过后，在1980年代中前期，它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当然，蒲松龄所生活的17世纪，当时经济文化仍在世界领先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莫言为首的一批中国作家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富克纳那里获得启示，走上了“寻根”之旅：一是走向故乡，走向乡土；一是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与民间文学传统中发掘可借鉴的资源。在两条路线的交叉点处，“蒲松龄”脱颖而出。需要指出的是，莫言之所以选择“蒲松龄”，所谓地域，所谓同文化源只是表层因素，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聊斋志异》中那超越时代、光耀后世的先锋文学质素与精神，也就是说那曾给蒲松龄带来自信又让他深深跌入现实之自卑的东西在莫言那里恰恰被奉为至宝。莫言从“聊斋”那里感受到那凄凄幽幽而又坚定不移的“讲故事”之信心，接过了文学传承的薪火，以现代性的眼光加以转化、改造，将其带入世界文学舞台，并且获得了中国文学空前的世俗性肯定。

莫言的世界性文学成功不仅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当代文学、百年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的文化课题也关系重大。我们相信，这个一百多年来的文化难题之解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开始进入新的里程碑，莫言站在瑞典文学院向世界宣告“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时刻，必然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绽放得最绚烂的时刻之一。同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的获奖就与莫言有很大差别。这不仅仅是以何种国籍获奖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是以何种文学面目获奖的问题。说穿了高行健所获得的肯定是以一个中国作家以西方文学方式获得西方文学的认可，而莫言得到的认可则是一个中国作家以中国文学的方式赢得世界文学的认可。

综上，蒲松龄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都面临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相纠结的问题。但是两者的性质不同。蒲松龄的困扰是个人性的，是文化先行者之于滞重的时代文化主流的悲剧，莫言的矛盾则是一代作家的共同问题，是民族性的，是落后民族如何重获文学与文化自信的问题。有趣的是莫言解决问题的钥匙正是从困扰蒲松龄之处找到的。蒲松龄在他有生之年也难以猜到他以性灵之真捕捉到的缪斯之光会在莫言处最大程度变现，开出了斑斓瑰丽的花。如果蒲氏泉下有知，应该会灵魂安息吧。

参考文献：

[1] 莫言.体味五光十色 百味杂陈的人生[N].淄博晚报,2010-04-13.

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和在地性

王 朱 杰

（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谈文化自信要注意两点：

一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必须是一种“敞开”面向的自信。因为要谈中国文化，就必须首先对中国文化传承、新变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梳理。如刚才贺立华老师所说，从古至今，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是帝制时代的古典传统，一是近代以来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作者简介：王朱杰（1981-），男，山东平度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博士。

特别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现代传统，前者可名之为古典文化，后者为五四新文化。古典文化大体上以“修齐治平”为指向，新文化以求取民强国富，汲汲于整个国族主体和个人主体的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两者之间既有传承中恒定的元素，也有断裂中产生的新质。历史已经证明，固守前者既无力应对近代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无法回应纷纭复杂的当下社会现实，仅着眼后者似乎也无法彰显华夏民族“这一个”的独特。所以谈中国文化自信就首先必须同时站在中国文化的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保持一种敞开的面向，不能偏废其一，否则我们的自信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狭隘和盲目的。

二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还必须是一种“在地性”的自信。因为一种文化必须要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来体现和开创。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各种原典文献中，流传在对原典典籍的注疏、训诂中，更沉淀在劳作于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如你我身上，存活在这些人对世间万物的认知和生命体验之中，运行在有关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的肌理里。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古国来说，即使步入工业化乃至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即使我们正在向着城市化高歌猛进，我们背后依然拖曳着数目巨大的农民群体，依然有着体量巨大乡土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几乎沾溉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所以谈文化就不能不谈乡土的剧烈变迁，不能不谈农民的“生死疲劳”。莫言本人对一些民间艺术形式如茂腔、剪纸、年画比较喜爱，乡间的一些风俗习惯、鬼神信仰也在他的文本中多有体现，我想正是对这些东西及这些东西所熏陶、形织出来的思维、心理、情感结构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现实。尽管这里的文化是世俗的、土气的、甚至是蒙昧的妍媸毕露的，尽管不是那么高大上，然而却是活的、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之中，生气郁勃、姿态万千、杂花生树、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

有关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和在地性，在莫言的文学叙述中都得到了浓墨重彩、丰沛淋漓的呈现。比如《檀香刑》里孙丙对德国殖民者的抗争、《红高粱》中余占鳌对日本侵略者的伏击，《蛙》中村民们对现代生育技术的拒绝和接纳，正是求取民强国富的近代传统在乡间的懵懂觉醒，而这种觉醒我想并不是某种现代文化、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启发、引导的结果，完全是一种从自身现实处境以及对这种处境的原生性理解出发，自发自为的、“在地性”的斗争，里面充满了不屈不挠的血性，充满了不甘麻木平庸、风风火火的快意人生追求，也显示了其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盲目、蒙昧的阴影，而这一切又是古典文化传统培植、孕育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缠绕、纠结的生存状态，显示了我们这个古老伟大民族的全部乡土现实，也是我们的文化现实。它能激昂我们无限向上的意志，却也留下了一言难尽的苦涩、悲凉的气息。所以只有从这样一种文化现实的感验出发去谈文化自信，方能实现文化的浴火重生，我们的自信才是坚实的、行稳致远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读懂莫言，理解莫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国文化现实。

责任编辑：冯济平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New Horizons of Research on Mo Yan (Written Conversation)

ZHANG Zhi-zhong etc.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an be said to be the arduous and fruitful cultural journey of seeking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the new and complicated world culture and art surged into China, causing a strong cultural shock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who began to imitate and follow.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thinking about combining with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ushering in a new stag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generation of writers in their gradual bloom revealed to the world China's turn from decline, destruction and crisis to national revival, cultural renaiss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thi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 Yan's literary creation indeed embodie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Mo Yan; cultural confidence; Chinese experience; Chinese meteorology; literary mainstream